

# 毛泽东成人教育思想初探

刘礼堂

毛泽东成人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丰富了马列主义教育理论的宝库。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身体力行,亲自抓成人教育,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有关成人教育的宝贵思想。本文通过毛泽东对成人教育方向、任务、学习方法、教学原则等方面的论述,阐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过程中,为了配合全党的政治任务、军事任务及经济任务的完成,把马列主义教育原理运用到中国实际而形成的系统成人教育思想。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毛泽东成人教育思想是其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在我国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根据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这些教育思想是我们工作在成教战线的同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笔者从四个方面对毛泽东成人教育思想作些初步探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同行更广泛、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

## 一、成人教育必须为党的总任务服务

成人教育必须为一定社会的政治服务,为党的总任务服务,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改变社会对教育的影响性质,使教育摆脱剥削阶级影响”<sup>①</sup>。列宁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后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sup>②</sup>。依据这一观点,他确立了教育对于政治的从属地位。毛泽东不仅维护了马、恩的观点,还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sup>③</sup>。毛泽东这里所讲的“文化”是包含“成人教育”在内的,因为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成人教育。他的这一观点,既肯定了成人教育对政治

和经济的从属作用，又肯定了成人教育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反作用。通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经济和政治三者之间，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教育是为经济服务，为政治服务，终归是为政治服务的。

毛泽东关于成人教育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极其鲜明而毫不动摇的。早在1917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第一师范亲手创办了工人夜校，招生的主要对象是被拒之门外的工农劳苦大众，其宗旨是“唤起工农千百万”、为进行“社会改造”、“思想革新”<sup>④</sup>、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他亲自为工人授课、宣传革命思想。1921年6月毛泽东便在长沙创办了第一所以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为宗旨的成人大学——湖南自修大学，他把“养成健全的人格，荡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sup>⑤</sup>。1924年，他回到韶山办起了农民夜校。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使他们“几个月后，都跑到了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sup>⑥</sup>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瑞金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干部教育学院”、“苏维埃大学”，其办学宗旨是“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各民众的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sup>⑦</sup>。

抗日战争开始后，民族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配合，二者之间的不配合现象应当免除”，“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sup>⑧</sup>在这样的办学思想指导下，我党在陕北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大学”和“中国女子大学”等成人学校，其办学目的就是为抗战服务。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全国战争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发出了“把军队改变为工作队”<sup>⑨</sup>，并明确地指出：“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sup>⑩</sup>遵照这一指示，各野战军及时举办了许多轮训队、集训队、干部班，解决了当时解放区和大城市的干部问题，毛泽东还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提出了培训干部的重要性，他在1948年11月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同时教育干部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本领。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加强干部培训的决议。决议强调开办党校或加强、扩大已有的党校，培养部队所需要的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当时部队和地方的成人教育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大行政区还成立了“人民革命大学”、“军政大学”、“中原大学”、“东北大学”等。招收知识分子入学、对夺取全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向全党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我们的同志必须用较大的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sup>⑪</sup>这就为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党顺利地接管城市工作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党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为了探索经济建设的规律，1956年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sup>⑫</sup>。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建

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弄清楚它的规律。”<sup>⑧</sup>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各个革命的重要时期,总是通过成人教育,统一全党的思想,使大家步调一致地沿着党的政治路线前进。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论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强调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和与经济的关系一致性时候,并没有将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视为一回事。在处理教育和政治关系的重大课题时,毛泽东处处注意了教育同经济的关系,把通过成人教育来提高工农素质,适应经济发展看得十分重要。当然,从经济对政治的作用来说,协调成人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是最终协调成人教育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但在这个“最终”之前,经济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毛泽东对成人教育与经济间的这种规定,实际上是从这个相对独立性出发的。成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与经济的关系确立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成人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的变化便成了自然的事。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他很会审时度势,处理好这些变化。毛泽东对成人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原则灵活性处理,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最好体现。

## 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毛泽东无论对文化、艺术,还是教育工作都非常重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他十分重视群众的创造性,并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办普通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工农教育,即成人教育。他在1934年7月指出:“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识字的方法有夜校、识字组和识字牌……这是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劳动应该使之向着全苏区一切城市与乡村中间开展去。”<sup>⑨</sup>这里指的虽然是普及,但同时又注意提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都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起来,把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起来”。<sup>⑩</sup>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百分之八十的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又指出:“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教育家和老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sup>⑪</sup>。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的“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的光辉成人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究竟应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还是寻求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955年毛泽东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的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的按语说:“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是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这就是后来“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提出。“两条腿走路”方针的主要内容有两点:1.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2. 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的半日制学校和业余教育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幼儿教育并举。这里谈的业余教育、职业教育均属成人教育的范畴。毛泽东十分强调半

工半读，勤工俭学，多种形式办学问题。例如，他在《一个受人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一文的按语中说：“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同消灭文盲结合起来，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1957年，毛泽东在七省、市教育厅局长的谈话中又说：“关于社办、队办学校问题，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并且说：“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从以上内容为标志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的提出，为我们今后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积累了十分重要的经验。邓小平完全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总方针，认为发展我国的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早在1958年他就说过：“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sup>⑧</sup>。1983年他又说：“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业余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sup>⑨</sup>。改革开放15年来的教育发展情况，也体现了这一思想。由此可以看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目前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典范。他历来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践知识；既提倡读有字的书，又提倡读无字的书；反对读死书，提倡读活书。他认为学习的书有两种，一种是有字的讲义，教科书；另一种是无字书，即社会大课堂。读无字书，即是要面向社会，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一言以蔽之，读无字书的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历来厌恶那种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的风气，对于“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这类行为，他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sup>⑩</sup>他倡导的“有的放矢”的学风，既体现在教学中的根据实际需要，安排教学课程上，也体现在理论联系实际上，还体现在讲课后的用社会调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以及检验所学理论的是非和发展新的理论诸方面。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早已践履了，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就在笔记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主张“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为此，在一师时他和学友肖学升一道游学千里，遍访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了解民间风土人情，了解人民疾苦，从而获得了许多难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并且磨炼了自己的意志。1919年毛泽东指出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思想界是“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法。”虽然，尽管毛泽东当时涉猎的马列著作不多，但他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为他日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时刻注意对社会的学习和研究，倡导社会调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阳、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的情况，广泛接触农民运动和农运干部，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著名篇章。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给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话时指出:“要深入实际,要甘当小学生,要密切联系群众,群众是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如不接触实际,光靠翻书本,背教条,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要真正懂得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农学习”。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名论著,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结晶。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他不仅经常下到基层了解情况,而且经常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深入实际,学习社会。他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sup>②</sup>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许多论著。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 四、学以致用教育原则

在为中国人民奋斗的半个多世纪里,毛泽东总是把学到的书本知识融会贯通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他的名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以致用教育原则,是毛泽东身体力行的总结,是毛泽东成人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必须符合实际,体现“实用性”和“少而精”的原则。中国成人教育的主体是工农,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毛泽东很强调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工农大众的实际出发,来确定教育内容。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广大工农群众缺乏文化,加上繁重的劳动和贫困的家底,使中国的农民教育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不可能很快发展成“阳春白雪”。而工农大众学了文化知识就要用,不用就不学,这是中国的实情。毛泽东很了解这种实情,正是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他才那么厌恶工人补习教育上的学科设置“多太复杂”和“贪多嚼不烂之弊”<sup>③</sup>,而竭力主张学科的设立要适合工人的需要,不要太复杂,每一段只要一种学科,教材的内容和排列则要分深浅的需要。

其次,是在教学方式上提倡“启发式”、“自学”等教学方法。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对学校的“注入式”教学方法极为不满。他认为“注入式”教学是“戕贼人性”,“消磨个性,灭掉性灵,使庸儒的随俗沉浮,高才的相与裹足。”<sup>④</sup>他极力主张“启发式”教学方法,意在引导学员积极思索问题,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自学是毛泽东读书生涯中的一个有闪光意义的组成部分。提倡自学,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是青年毛泽东自学的座右铭。他在湖南省图书馆半年的自学生涯中,使他终身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借助于人类知识的宝库,使毛泽东树立了矢志救国救民的信念。青年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宗旨为“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继之发展为在“团体研究”的方法上,则由“学友因志愿相同,分别组织”,“随时开辟辩论商榷”<sup>⑤</sup>,后来进一步明确办学宗旨为“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际社会改造的准备”,即“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sup>⑥</sup>湖南自修大学虽仅存在两年,1923年被解散了,但这种在个人自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中国革命实际提出

的问题，进行集体共同的讨论、研究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教育和群众以及干部教育的体系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例如“干部班要用讨论式”<sup>⑤</sup>就是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制定的教授法之一。

“活到老，学到老”是毛泽东一贯的自学格言，无论是在青年时期的求学生涯中，还是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总是矢志读书，博览群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读书更为刻苦了，虽然他一方面为党和国家大事操劳，心系万事，但另一方面总是抓紧时间学习。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站得更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渊博的知识。他注重各类知识的学习，在建党时期，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的建党理论；在革命战争时代，他刻苦攻读与此相关的书籍，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书籍，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不仅如此，他还能够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随时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到了晚年，为了广泛地了解和研究各国人民革命和斗争的历史，为研究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写作革命理论的工作，毛泽东又决心努力学习英语。毛泽东自学英语的精神和毅力是感人至深的，这位笃志嗜学的领袖，不仅自己勤奋好学，孜孜不倦，还要求党的干部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发挥“马不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党政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吸取当代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精华，均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当然，毛泽东成人教育思想博大精深，远远不是以上四个方面所能论述全面的。我们今天探讨毛泽东成人教育思想，主要是他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不朽的成人教育思想精神丰碑，给我们以教育和启迪。伟人虽逝，风范长存。毛泽东在成人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成人教育的科学研究和推动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注 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9页。
-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5页。
-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695页。
- ④⑤ 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26页。
- ⑥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 ⑦ 美·卫·特里尔著，刘路新等译：《毛泽东传》，1989年版，第265页。
- ⑧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5、1406、1041、829、850、670、87、88、798、595页。
- ⑰ 戚永昌：《中国职工教育史》，第84页。
- ⑱⑲ 《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第16、36页。
- ⑳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新时代》第1卷，第1号。
- ㉑㉒㉓㉔ 《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第1辑，第372、42、57、58页。

（责任编辑 江 平）

# 我国教育法学：发展历程与存在的问题

谭晓玉

本文回顾了1981年以来我国教育法学研究的历程,简要概括了各阶段的基本特征,并就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观点加以评述,同时阐明了作者的见解,旨在推进我国教育法学学科建设的步伐。

## 一、引言

教育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最初形成于本世纪50年代末的德、美、日诸国。我国开展教育法学的学术性研究,起步较晚,始于80年代初期。目前,就学科发育水平状况而言,我国教育法学尚处于其发育阶段的初期。本文将对我国教育法学学科建设已走过的历程作一回顾,简要概括各研究阶段的基本特征,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纷呈的观点加以评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旨在加快我国教育法学学科建设的步伐,促使教育法学这门学科在我国尽早地“发育成熟”。

## 二、研究历程概览

我国学术界把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探讨,始于本世纪80年代初期。就研究历程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 (一) 发端时期(1981—1985年)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法制建设重新启动,给“劫后余生”的教育法制注入了新的生机。1980年,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由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通过的第一部教育法律。它标志着新时期我国教育法制的开始。1981年,《甘肃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在第2期刊登了《谈谈我国教育法令的问题》一文,随后,报刊杂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立法的文章。从文章内容上看,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评介国外教育立法经验的文章,一是对我国教育立法问题的研究。就学科建设讲,这一时期还没有开展学科意义上的研讨,“教育法学”尚是一个未见诸于报端的萌芽之物。

### (二) 形成时期(1986—1990年)